



《拂晓报》与雪枫军政大学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抗战珍贵文物中，有一份1943年编印的《拂晓报》，以及雪枫军政大学的“雪大”证章。这份《拂晓报》是新四军游击支队机关报，长37厘米、宽26厘米，1959年由广州军区移交军事博物馆。

全面抗战开始后，彭雪枫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1938年春，彭雪枫调赴河南确山竹沟，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组织训练抗日武装。同年9月，中共中央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任命彭雪枫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了鼓舞东进气，宣传群众，打击敌人，1938年9月29日，彭雪枫在竹沟主持创办了《拂晓报》，撰写了发刊词《拂晓报——我们的良友》并为刊头题字。他在发刊词中说：“拂晓代表着朝气、希望、革命、勇进、迈进有为、胜利就要到来的意思。军人们要在拂晓出发，要进攻敌人了。志士们在拂晓要奋起，要闻鸡起舞。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

当时，新四军一无餽源，二无后勤供应，生活艰难，物质条件非常艰苦。彭雪枫发动大家群策群力，弄到2支铁笔、2块钢板、2筒油墨、1把油刷、1块木板和半筒蜡纸，就动手办起了报纸。为解决报纸的印刷问题，彭雪枫亲自往返40多公里，给报社购置油印机。报纸为油印四开四版，开始为不定期，后长期保持三日刊。1941年5月4日，新四军第4师进入津浦路东，9月6日又增出了同型的新闻纸四开一张的《拂晓报·部队版》，专为单位而设。《拂晓报》的主要编辑有阿乐、单斐、易河、庄方、陈陈等，彭雪枫是该报的创始人和领导人。随着《拂晓报》影响的日渐扩大，一年后发行量由创刊时的几百份增加到3000多份，它也成为豫皖苏边区“指引方向的罗盘”。此后，《拂晓报》几经合并、停刊、复刊，先后成为中共安徽省宿县地委和蚌埠地委机关报。

“雪大”则是由新四军游击支队随营学校发展而来。1939年初，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继续东进，并建立了随营学校，当时共有200多名学员，彭雪枫亲自担任校长兼政委。随着新四军游击支队影响的日益扩大，许多地方武装相继加入该部。到1939年底，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部队发展到15个团，共1.78万余人。经新四军军部决定，1940年2月1日，游击支队正式改称新四军第6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随营学校不断发展壮大，学生达到500多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40年3月，以新四军第6支队随营学校为基础，成立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简称“抗大第四分校”），彭雪枫兼任校长。这是新四军中成立最早、历时最长的一所分校，共培养近5000名干部，后来为新四军第4师和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艰苦抗战期间，彭雪枫总结实践经验，对抗日战争的游击战术和政治工作问题进行了论述，亲自编写《游击战术》《战略战术讲授提纲》等教材，并经常到第四分校授课。

皖南事变后，彭雪枫任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42年兼任淮北军区司令员，与政治委员邓子恢等领导根据地军民同日伪军及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4年8月，新四军第4师兼淮北军区为恢复原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由汴（县）南、酒（宿）（县）地区西进，遭到了国民党顽军的阻拦。9月11日，在河南夏邑县八里庄战斗中，彭雪枫壮烈牺牲。为纪念彭雪枫，第四分校更名为雪枫军政大学（简称“雪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加强和统一华中地区的军校教育工作，华中军区决定将辖区内的原抗大第四分校、抗大第九分校以及华中野战军随营学校合并，于1946年4月在高邮古集镇首立了华中雪枫大学。此后，华中雪枫大学曾几易校名、校址，历经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总高级步兵学校等不同时期，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

《南轩记》中的耕与读

曾巩（1019—1083年）是北宋最有影响力的古文家之一，他的《南轩记》是一篇自勉性文章，也是宋代较早明确表现士人耕读生活的记文。读此文，可以了解曾巩的人生志趣与道德追求，也可看到他清寒生活中的持道守节的自我训诫。

《南轩记》作于北宋至和元年（1054年），曾巩与弟弟们在南丰耕作谋生。至和元年，曾巩已三十有六，稍有积蓄，在城郊十余里的田边修葺茅屋，名为“学舍”，用以藏书、读书。南轩是“学舍”中向南的一间。曾巩在这里得到了身体和精神的的双重历练，并在《南轩记》中记叙了他的耕读生活与人生思考。作为土地的主人，他在这里躬身进行农事劳作。“得邻之弗地蕃之，树竹木，灌蔬于其间”，有幸得到一点田产，以篱笆围起，栽植竹木，种植谷蔬，导水灌溉，亲力亲为。从事劳动生产，他在四时轮换中，开垦、栽植、灌溉、收获，农忙甚至会在田间地头吃饭、夜宿。天暖水绿时急于耕地，晴日抓紧赴田间劳作，与弟弟们共同收割新稻。既是生存的需求，也有心性的磨炼、价值感的获得，他体会了穰穰满家、稻足鸡肥的喜悦。物质生活逐渐获得改善，正是曾巩带领家人勤于稼穡的结果。

“伏闲隐奥，吾性所最宜”，躬耕田亩之中，居于幽僻之地，切合他的本真性情，“结茅以自休，嚣然而乐”，有余地可修建茅屋，在此休憩，是难得的闲逸之乐，因此曾巩说，“世固有处廊庙之贵，乐万乘之富，吾不愿也”，以廊庙之贵、万乘之富也不愿交换。不过，于他而言，这不愿交换的，是少有的安闲，更是既耕亦读的生活。曾巩在这茅屋收藏了数量极为可观的书籍，达两万册。书籍的时间跨度大，从秦汉至宋皆有收入。曾巩认为，这些藏书是圣人先贤、有识之士殚精竭虑、发挥专长、分析辨别天地万物的道理而写成的。所著或论赞美好事物、讽喻心怀不轨之人，或感发于微小之处而寄托深远。“于天地万物，小大之际，修身理人，国家天下治乱安危存亡之致，罔不毕载”，对天地万物、小事与大道之间的关系、自身修养、国家治乱安危等，都加以详细记载。与这些藏书在一起，正如与益友相切磨，颐养心性、明晰事理、增长见识。这在躬耕田亩、处理家务之外，他“虚窗达深瞑，明膏续飞光”，日夜苦读。结合田间劳动的经验，他还以春秋收获、研磨谷物比喻学海求索的过程。足够勤劳，就自然会有稻谷收获而不用担心粮仓空匮。努力经营，所得也会积累越来越多。“既多又须择，储精弃其糠”，有丰富的储备，就可以择出糟粕，留下精良的部分。“昔疲渐开辟，新输入收获”，学问日益精进，当然是“万乘之富”交换不来的。

北宋士人文辞间常见以天下为己任的阔大情怀，不见用于世时，亦能持道自守。曾巩即如此。居南丰，远京师，处大山长谷之中，日日为稻粱谋，却不忘手持书卷，孜孜以求，是因为“所好者远”，喜圣人之言，愿以儒道济天下。未能实现之时，他便以儒家君子人格要求自己。两次科考不第，家中杂务繁复，曾巩承接孔子“忠恕”“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思想，提出“养吾心以忠、道守而恕行之”，要用忠义来修养自己的道德、检视自己的操守。忠义要丰厚，犯了错就加以改正。要勇于进取，不知止息。他还认为，士人应“得其时而行”，如果君子有好的机遇还要守在深山长谷而不出去做官、有所作为，是不对的。“不得其时则止”，如果没有遇到好的时机，那就不要勉强，这时还要不顾一切推行主张，也是不恰当的。居于卑巷穷庐，衣食窘乏，田中劳作，筋骨疲惫，曾巩可谓“不得其时”，但不抱怨不懈怠，孝亲友爱，操劳弟妹婚嫁，静心读书，怡然志志，带领弟弟、妹婿成就了“一门六进士”的辉煌，践行了“通家之修身、治家之道”。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持道自守、自我训诫，待出仕为官，曾巩到越州、齐州等地任职时，也能怀抱兼善天下的理想，革除赋役弊端、积极救灾、兴修水利，“除其强而振其地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整顿社会治安，兴建学校、讲读六经，实现人民安乐。

在耕读生活中，曾巩广读百家之书，开阔视野，却“一正以孔孟”，愈发坚定以儒道为思想根本，并努力以文传道，至老不变。他还认为文章有留存圣人之道的作用，圣人之道不经辨析不能得以显明。因此他强调研读儒家经典，评价文章也以“道”为根本标准。他在《南轩记》中提醒自己要坚持道自守，并将所作记文书于墙壁，“蚤夜览观焉，以自进也”，日日观看，以鞭策自己有所进步。

《南轩记》所呈现的耕读生活，是曾巩最重要的人生阶段之一，他以耕读为乐，抱持“扶衰救缺之心”，以儒家君子人格自律，在耕读中改善了生活状态，也促进了学行的提升与文章的精进。嘉祐二年（1057年）曾巩及第，走向仕途，在京师校勘、整理史书、诗文集，外任时勤劬为政，颇有治声，其间皆以文传道，不为空言。《宋史·曾巩传》评其“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纤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派”，是给这位持道自守、胸怀远阔的文章家的最好评价。明清时期，曾巩得到唐宋派、桐城派的尊崇，文章成为士子摹习的典范，遂列于“唐宋八大家”之中。

盛唐时期典籍管理与国家藏书

唐朝于公元618年建立后，经过近百年的巩固和发展，到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步入“盛唐时期”。这一时期，在政治秩序稳定、社会经济繁荣推动下，国家藏书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

唐玄宗即位后，十分注意从历史发展中汲取经验与教训。《旧唐书·玄宗本纪》载玄宗于“听政之暇，常览史籍”，特别重视“事关理道”的大环节、大问题。玄宗还明确为“国之载籍，政之本源”，高度重视国家藏书建设。《旧唐书·经籍志》载，开元三年（715年）九月，玄宗与“更日侍读”的左、右散骑常侍马怀素和褚无量“言及经籍”，说“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令官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缀，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卿试为朕整比之”，提出了推进国家藏书建设的任务。为郑重其事，玄宗颁《赐褚无量马怀素诏》，诏命两人负责具体实施，并提出了“令经史备”的目标。

在玄宗诏命下，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建设立即开展实施。从有关史籍看，马怀素和褚无量有着明确分工，又在元行冲、张说等人继任期间得以持续推进并取得显著成果。

马怀素主持秘书省编目工程。据新旧《唐书·马怀素传》，马怀素针对“秘书省典籍散落，条流无叙”的状况，于开元五年

（717年）十二月上书玄宗，建议在南齐目录学家王俭所编《七志》基础上，将南齐以后至开元时的典籍汇编入一部目录著作中，以摸清当时国家藏书的实际情况。玄宗立即任命马怀素为秘书省长官秘书监，并命国子博士尹知章、四门助教王直、直国子监赵玄默等20余人“分部撰次”，在马怀素统筹之下分工协作。马怀素还奏请玄宗以秘书少监卢甫、崔沔为修图书副使，以秘书郎田可封、康子元为判官，完善了搜访逸书、刊正经史和分部撰录的工作机制。马怀素于开元六年（718年）七月病逝，所主持的编目工程只进行了一年半的时间，虽“未能有所绪别”，但“粗创首尾”，功不可没。开元七年（719年）七月，玄宗命元行冲接替马怀素，继续组织秘书省的编目工程。

褚无量主持乾元内库书校写工程。据新旧《唐书·褚无量传》，褚无量针对“内库旧书，自高宗时藏官中，甲乙丛倒”的混乱现象，“建请缮录补苴，以广秘籍”。开元五年十二月，玄宗诏命褚无量为专使，“于东都乾元殿东厢部汇整比”，着手缮录校写工作。褚无量还上书玄宗，以闻喜县令尉卢偃等4人“分部鑑定”，分工协作。有关史籍记载表明，褚无量主持的东都乾元殿内库书校写工程，是把内库藏书按甲、乙、丙、丁四库，分库上架排比、清理校刊。一年半之后，这一工程基本完成。开元六年八月，玄宗敕令“于秘书省、昭文馆、礼部、国子监、太常及诸司官等，借写及整比”，向乾元殿之外的藏书机构及国家官员“大加搜写，广采天下异本”，以补充内库藏书。同时，选调秘书丞殷承业、右赞善大夫魏哲等7人为丽正院（乾元殿改名）修书学士，还制定了编目要求及细则，继续推进内库藏书校写工程。开元八年（720年）正月，褚无量年老病逝，玄宗又命元行冲接替，继续“整比群书”。

元行冲主持秘书省、丽正院编目校写工程。元行冲先后接替马怀素、褚无量后，将先前由马、褚分工负责的秘书省、丽正院编目校写工程合并在了一起。据《唐会要·集贤院》等史籍记载，开元八年十月，玄宗敕令：“学士等人经三年已上，为年深。若校理精勤，批驳多正，及不详覆，无所发明，委修书使录奏，别加褒贬。”元行冲奉敕贬黜修书学士不合格者，把合格的秘书省原修书学士陆绍伯、马利微、毋奭、韦述等13人转到丽正院，将秘书省的编目工程合并到丽正院。同时新选朝邑县丞冯朝隐、冠氏县尉尉权献等7人为丽正院修书学士，将学士总人数增加到20人。元行冲进而按照“通家古今书目”方法，依据丽正院实有藏书，有何书便著录何书，对20位学士作了工作上的划分，分别编目总籍、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经学士们的集体劳作，开元九年（721年）十一月，丽正院藏书的编目工程完成，修成《《群书目录》二百卷，藏之内府”。开元十年（722年）九月，元行冲衰老罢职，玄宗命宰相张说继掌丽正院藏书建设工作。

张说等人继续主持内库书建设工程。张说奉命接替元行冲后，以秘书监徐坚为副手，又以张惟“知图书括访异书使”。在编目工程完成后，特设专使，专门负责搜求购募异书珍本，以努力扩充图书数量。与此同时，张说还奉命组织学士们进行重要著述的编纂。如《唐会要·集贤院》载，开元十二年（724年），玄宗命张说组织撰修《封禅仪注》，以应东封泰山之需。开元十三年（725年）四月，《封禅仪注》修成。为表彰学士们的功绩，玄宗赐宴于集仙殿，改丽正院为集贤院，并设“十八学士”。张说病逝后，张九龄、萧嵩、李林甫继以宰相知集贤院事，继续组织实施国家藏书建设。

国家藏书建设在开元、天宝年间取得了显著成果，国家藏书总量蔚为大观。宋朝欧阳修、宋祁编撰《新唐书》时，不禁赞叹道：“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谓盛矣！”

玄宗朝整理撰修好的四库书分藏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均以质量上乘的益州麻纸书写，在装帧上均为卷轴装，即宋朝欧阳修所谓“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官修政典《唐六典》记载了当时四库书的储藏和装帧情况——“四库之书，两京各一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纸写。其经库书，白轴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细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为分别。”其用纸之高标准和装帧之考究，被现代学者誉称达到了“绝妙的境地”。另有学者在研究后指出，玄宗朝用不同颜色的轴、带、签以别四库书的做法，为清朝撰修《四库全书》所沿袭发展，以绿、红、兰、浅灰四色封皮以别经、史、子、集部四库。

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举国之力托起蘑菇云

60年前的10月16日，随着西北大漠腾空而起的巨大蘑菇云，它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铸就了核盾牌。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鲜明体现。新中国刚刚成立，新生政权就受到西方有核国家的多次核讹诈、核威胁。为打破核垄断、抵制核讹诈、应对核威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毅然作出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1955年1月15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通过了代号为02的核武器研制计划。他讲：“在今天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开始起步并向前发展。随着中苏两党关系出现分歧，苏共中央于1959年6月20日致电中共中央，决定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为了牢记这个日子，党中央把原子弹工程代号定名“596”，决心要造出“争气弹”。1960年6月，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与中国的全部经济合作项目协议，撤走全部援华专家。这年七八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会议确定了“埋头苦干，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奋勇前进”的发展方针。党中央不信邪、不怕压、勇于战胜困难的决心和气魄，极大振奋了全体科技人员干事创业的热情。现在来看，党中央重点突出尖端技术发展，是一项很有远见、很有胆识的战略决策。邓小平讲，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是改变新中国命运的“交响乐”，也是数十万人合奏的辉煌乐曲。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国防科技工业领导机构，逐步形成大力协同、集智攻关进行“大科研”的局面。

理论设计是研制原子弹4个部分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次，十几位饥肠辘辘的年轻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地计算了一个月，结果却与苏联专家给的数据大相径庭。朱光亚、程开甲、彭桓武、郭永怀和科研人员三班倒连续干了3个月，进行了3次计算，数据还是不对。一直到第8次、第9次计算，结果还是照旧！最后，周光召经过反复审核，以他深厚的理论功底一锤定音：苏联的数据是错误的，中国人的计算结果是正确的。“九次计算”历时半年，终于摸清了原子弹爆炸过程的物理规律。

理论设计的问题解决后，还有实验研究、生产制造和现场试验，这些都需要“千军万马”一起来鸣奏。为加强组织领导和全国大协作，1962年11月17日，党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中央专委会成立后，以力争1964年爆炸原子弹为目标，在全国范围内组织26个部委、20多个省市区、1000多个单位组成强大的技术力量投入“争气弹”的攻关会战。

从1962年开始，西北荒漠的金银滩成为原子弹的“新家”，这就是如今广为人知的马兰基地，代号“221”。为了配合中央决策，世代居住在这的6000多名牧民，舍小家为大家，没有向政府提出任何条件，义无反顾地搬离故土。在中央专委的大力协同下，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以及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研究机构“五大方面军”拧成一股绳，组成全国规模的协作网，先后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全国一盘棋”，汇聚集体的智慧是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的重要经验。

研制原子弹是一项技术含量极高的系统工程。新中国进入“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需要人“急”，需要才“专”，但现实是“专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为广纳天下英才，我们党实行“不管先后，都一律欢迎，一视同仁，而且允许来去自由”，并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宣传，通过外交手段谈判协商，制定各种激励政策。

海外学子积极响应，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钱三强、程开甲等冲破重重阻力，义无反顾地投入祖国的怀抱。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从苏联回国的王淦昌突然在国际物理学界消失了，但在原子弹研制队伍中出现了——一个叫王京的默默无闻的学术带头人。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的王承书历经艰辛回国后，3次被问到能否开辟铀核聚变这一陌生领域、能否转行从事高浓缩铀研制、能否为国家核事业隐姓埋名一辈子时，她都斩钉截铁地答道：“我愿意”，并一生为之践行。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阐释了“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家国情怀。张劲夫曾讲，我们靠的是一批从国外归来的有高度爱国心的科学家，又靠他们带出一批年轻的科学家，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具有较高水平和优良作风的科技队伍。

党中央不仅在政策上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生活上也十分关心他们。三年经济困难期间，为解决科学家们生活上的困难，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进行讨论，统一考虑解决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具体领导和组织新中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多次表示，要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他以个人名义向北京、广州、济南、沈阳和海军等领导机关“募捐”，要求尽快快发一批副食品支援项目攻关的科技人员。我们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创造了一个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局面，大大激发了人才的创新能力。

苏联专家曾预言，没有外界帮助，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但是，中国人凭借一颗火热的爱国心和不知疲倦的大脑，因陋就简、自力更生，攻克了一个世界难题。

邓稼先奉命率领设计团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最原始的工具，辛辛苦苦、通宵达旦，终于把原子弹的设计轮廓勾勒出来。点火中子源技术团队接受任务时，不仅没有仪器设备，甚至基本的实验室都没有。科研人员不等不靠，就地用沥青油毡作顶棚、芦秆抹灰当墙建成实验室就马不停蹄地开工了。就是在这样简陋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成功捕捉到实验变化的宝贵瞬间。

在研制原子弹这个长长的链条上，还有成千上万普普通通的建设者们的无私奉献。

在人迹罕至的金银滩，来自全军26个单位的5000余名指战员以3顶帐篷起家，进行“草原大会战”，很快，一个集科研、生产、生活为一体的核试验基地就在戈壁荒原上拔地而起。1999年，《纽约时报》曾以3个版面刊出特稿：中国是凭本事还是间谍来突破核武器发展？于敏指着报道中的一句话——“不用进行间谍活动，北京可能已经自力更生实现了自己弹头的小型化”对记者说，“这句话说对了，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定的方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决定战役走向的锦州攻坚战

“战锦方为大问题”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行到关键一年，人民期待已久的大决战终于到来了。这场大战役，是从辽沈战役开始的。9月7日，毛泽东指出东北野战军的攻击重点应指向北宁路上的重镇锦州，暂时不要顾虑长春、沈阳的敌人。在电报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有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

然而，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却徘徊犹豫于先攻打锦州，还是先攻打长春。中央军委一再指出，攻锦州是东北整个战局的关键所在。辽沈战役已经发起20天，部队兵临锦州城下之际，林彪再次动摇，提出回师攻打长春。毛泽东、周恩来看完电报后感到十分不安。毛泽东接连复两电，斩钉截铁地指出，攻打锦州部署已经完毕，“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

电报发出后一个多小时，中央军委收到了林彪放弃打长春最后下定决心攻打锦州的电报，毛泽东看后十分高兴，复电说，“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希望按照部署，大胆放手和坚决实施。

按照部署，东北野战军于10月13日肃清锦州外围守军，14日，向锦州发起总攻，“激战三十一小时，一举攻克锦州”。

锦州攻坚战，对辽沈战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此，辽沈战役才真正形成具有战略决战性质的大歼灭战。后来，毛泽东在《吊罗荣桓同志》一诗中专门以“战锦方为大问题”一句，指明锦州一战而关全局。锦州的解放，把东北的大门关上了，为接下来的全国解放奠定了基础。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后来讲：“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做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

“这里长眠着为解放锦州而献身的革命烈士” 锦州攻坚战，全歼守军10万余人。同时，东北野战军自身也付出了代价，共伤亡2.4万余人。

在锦州，有一条街叫“士英街”，为了纪念锦州战役中牺牲的烈士梁士英而命名。梁士英是众多战士中为解放锦州而献身的一个人代表。

1948年10月14日10点整，对锦州城的总攻开始了。时为东北野战军二纵五师十五团三营八连二排五班战斗组组长的梁士英，顺利地突破了敌人一道道封锁。就在关键时刻，梁路旁敌人的大碉堡封锁了前进的道路，尖刀排经过几次拼杀，手榴弹打光了，依然没有成效。连队干部决定组织爆破，梁士英立即请战：“把任务交给我，我一定能完成！”

梁士英脱下棉衣，提起两根连接的爆破筒，带了两颗手榴弹，紧贴着路基飞快地朝前跃进。敌人的火力比之前更加凶狠，子弹把梁士英身前的泥土打得四处乱溅。经过一阵艰难的爬行，他终于来到离地堡左侧十来米的一个小土坎下面。梁士英立即向地堡甩出两颗手榴弹，趁着爆炸时的浓烟，他跳出了土坎，把爆破筒塞进敌人的地堡眼里。正当他转身要跳离地堡时，敌人却把爆破筒推出了枪眼。梁士英见状毫不犹豫地弯下腰，把瞬间就要爆炸的爆破筒拿起来，猛地又塞进地堡里，并用胸膛顶住爆破筒，像一个钢浇铁铸的巨人一样，钉在那里屹立不动。“喋血明碉暗堡”，梁士英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部队和战友开辟了通路，牺牲时年仅26岁。

在锦州，还有一条街，叫云飞街，也是以烈士的名字命名。马云飞原名叶宗汉，曾担任中共锦州地下党支部书记，长期在锦州从事地下工作。解放锦州前夕，马云飞等深入敌人内部，搜集到包括锦州城防工事图等大量重要情报。总攻锦州时，马云飞为东北野战军三纵突击营带路，在突入敌人司令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在了胜利前夕。

“部队精神好” 锦州解放后，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作战的成功，并致电称赞“部队精神好”，望传令嘉奖。是什么样的“精神好”，让毛泽东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后来多次讲到？

辽沈战役胜利8年后，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讲到解放锦州时“精神好”的故事。他说：“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是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

纪律建筑在自觉性上，这便是让毛泽东多次称赞的“精神好”。从此，锦州苹果的故事，成为教育全党、全军生动的生动事例。